

# 中国古典社会学的近代命运

景天魁

---

**【摘要】**在清末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中国思想界一致认为荀子群学就相当于西方社会学。但群学在转型过程中却遭遇了被取代的厄运，“中国本有社会学”反转为“中国本无社会学”这一论断并没有经过严肃的学术讨论，而主要是西方文化强权和中国丧失文化自信以及教育失误的结果。总结群学被取代的历史教训，群学的现代化转型必须护“根”固“本”，彻底坚持“社会学中国化”，在群学古今贯通的前提下实现中西社会学会通。同时，必须加强学科基础建设，明确“务本”“兼容”的方针，由此找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道路。

**【关键词】**群学转型 社会学中国化 中国社会学崛起

**【作者简介】**景天魁，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C91-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1125 (2022) 06-0041-25

---

国家命运与学术命运高度一致，这在中国社会学这个学科里表现得特别明显。作为中国古典社会学，群学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应运而生，经过秦汉时期群学的制度化、隋唐宋时期群学的民间化、元明清时期群学的心性化，悠悠两千多年，虽然跌宕起伏，倒也频现精彩。到了近代，群学本欲实现现代化的转型，不料却遭遇国运衰颓，时运不济，面对强势传入的西方社会学，非但未能实现与之平等对话、中西会通，而且落了个被西方社会学取代的结果。中国古典社会学转型的初衷原本是为了适应新时代、求得新发展，结果却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中平添了一个群学危机。本来群学之名被社会学取代的过程已经够复杂的了，却又引出来一个“中国本有社会学”与“中国本无社会学”的根本分歧。所谓转型就是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结果却铸成了严重教训。群学在近代为什么遭遇被取代的厄运？这是中

国社会学史上抹不掉的必须破解的悬案。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至今130年来，其间围绕这个根本分歧所展开的中西关系、古今关系、体用关系的争论此起彼伏、错综复杂。群学之名被社会学取代，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原因是什么，应该得出什么教训？所见的过程不同、找出的原因有别，得到的教训就迥异甚至相反。这个问题的根本性使之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史、思想史的争论，更是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方向和道路密切相关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说，是一个不容漠视的根本问题。本文拟对群学（即中国古典社会学）在近代被取代的过程、原因和教训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讨论。

## 一、群学旧案真相：从“中国本有社会学”反转到“中国本无社会学”的过程

### （一）“中国本有社会学”原为共识

清末从1891年到20世纪初的约20年间，即西方社会学传入之时，中国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和有识之士发现其与荀子群学极为相似，于是他们认为这门学问中国本来就有——群学就是社会学。

#### 1. 康有为视群学为学科

1891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开讲群学（见于他的学生梁启超所列的课程表）。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将群学作为一门课程讲授（这里的“第一次”仅指近代，古代是什么情况无可稽考。但荀子及其后学都教过许多学生，其“教材”肯定包括《荀子》书中的内容，这是无须质疑的）。1896年，梁启超在《说群·序》中说，他曾就治天下之道请教于康有为，康有为答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sup>①</sup>这里的“以群为体”既然是可以用于“治千万年之天下”的一种“义”，那应该指的是他所讲授的群学。据此，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可见，群学对于康梁变法是起到理论指导作用的。应该肯定，康有为对于确立“中国本有社会学”的认知具有开启性的地位。

#### 2. 严复确认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暗合”

在近代学术史上，严复首先正式确立了“中国本有社会学”的认知，他起到的作用占有决定性的地位。当他开始译介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审慎思考过中国有没有类似学问的问题。一名之立，旬月踟

<sup>①</sup> 梁启超：《说群·序》，《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5页。

蹶，严复决意将“sociology”译为“群学”，将社会学这门学问追溯到战国时代荀子的群学，这绝不只是翻译问题，而是肯定了中国古代就有本土社会学。

在《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中，严复给出了确认“中国本有社会学”的理由。第一，字词义相似。“荀卿曰：‘民生有群’。群也者，人道所不能外也。”“群”和“社会”的字词含义都是人群聚合，由此“可知中西字义之冥合矣”。<sup>①</sup>第二，概念义相合。严复所说的“群”，作为概念，就是西方社会学所谓的“社会”。他仔细考察了《尚书》《易经》《论语》等经典，并与西学相比对，指出“尝考六书文义，而知古人之说与西学合。何以言之？西学社会之界说曰：‘民聚而有所部勒（部勒，东学称组织。——译者注），祈向者，曰社会’”。<sup>②</sup>第三，学科义相同。严复直接用荀子关于群的论述解释斯宾塞的社会学，说明他认为二者在学科意义上是相同的。严复写道：“‘群学’者何？荀卿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凡民之相生相养，易事通功，推以至于兵、刑、礼、乐之事，皆自能群之性以生，故锡彭塞氏（即斯宾塞——引者注）取以名其学焉。”<sup>③</sup>第四，关于群学的学科性质和功用。严复认为：“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sup>④</sup>在这里，严复明确肯定了群学具有相当于斯宾塞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学的学科性质，是一个专门的学科。第五，关于群学的学科地位。严复高度肯定群学（社会学）是其他学科之总纲：“……以群学为要归。唯群学明而后知治乱兴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呜呼！此真大人之学矣！”<sup>⑤</sup>此处所谓“大人”意为“达人”，是通达事理、一通百通之意。既然严复肯定荀子群学与斯宾塞所代表的西方社会学的字词义、概念义、学科义、学科性质和功用、学科地位都是相合相同的，那就相当全面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本有社会学。

足足90年后，费孝通称赞说，严复的《群学肄言》“在‘译余赘语’中说，‘窃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为变法维新开启思想’。改革社会的风云从此风靡全国，不能不承认严氏的远见超众。《群学》成为中国改革的启蒙也是社会学的光荣。严氏指出西方的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的儒学

① [英]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严复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页。

② [英]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严复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2年版，第3页。

③ 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页。

④ 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71页。

⑤ 黄克武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严复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脉脉相通，可惜这见识没有为后辈所重视”。<sup>①</sup>

### 3. 梁启超肯定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分类正同”

深受严复和谭嗣同启发的梁启超于1896年发愿“作《说群》十篇，一百二十章”。但仅作了《序言》和《说群—群理一》，没有继续作。原因可能与他头绪繁多、涉猎较广且逝世过早有关。这是梁启超学术生涯的一大遗憾，但从他的《新民说》等著作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群学思想。在《说群—群理一》中，他指出群学即合群的学问。在《说群·序》中他强调以“群治”救国，“太平世之治，群必以群”。<sup>②</sup>1904年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中，梁启超盛赞荀子是“社会学之巨擘”，认为群学“与欧西学者之分类正同”。<sup>③</sup>这些宏论足可为梁启超赢得群学阐扬者的学术地位。

### 4. 章太炎将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合观”

国学大师章太炎最以尊荀著称，他认为孔子之后唯荀子可称后圣。他既通过翻译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了解了西方社会学，其本人又精通国学，因而能够将荀学与西方社会学做统一的研究。他发表的《尊荀》《后圣》《儒术真诠》等文章，纠正了宋儒以来崇孟黜荀的旧观念，对清末群学复兴起到推动作用。<sup>④</sup>可见，在19、20世纪之交，看出群学与西方社会学“相合”的中国思想家不乏其人，章太炎也可被视为群学阐扬者之一。

### 5. 蔡元培完整阐述群学

早在1894年，蔡元培在所作《荀卿论》中就指出：“荀子以缮性为本，以隆礼为质，以积微为强，以解蔽为明，变化质气，克治私欲，有宋以来，儒先精语，多胎于是。”<sup>⑤</sup>他精辟地指出，宋代以来，儒家只是嘴上不表彰荀子，其实主要观点多来源于荀子。由是称赞荀子“诚六艺之大师，百虑之要归也”。<sup>⑥</sup>

1902年蔡元培作《群学说》，这是一篇正规完整的群学专论，全面阐述了关于群学的基本观点。该文给群学下了定义：“群学者，所以明人与人合力之道，而以其力与外之压力相抵者也。”他认为“由小群而大群也，至于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6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5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317页。

④ 王小红选编：《二十世纪儒学大师文库·章太炎儒学论集》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1页。

⑤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注：《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0页。

⑥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注：《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130页。

无可减，则合天下为群矣”。“天下”能合为“大群”就是“太平”盛世、“大同”世界。<sup>①</sup>在1917—1923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出“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实际地支持李大钊、陈独秀组织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挺身保护和营救学生。这些业绩均可视为对群学的运用和发挥，由此奠定了他作为群学阐发者的重要地位。

#### 6. 刘师培从学科性上论证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刘师培，1905年在《周末学术史序》中认为，即使采用西方近代划分学科的方法，也可以从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学中划分出心理学、伦理学、政法学、计学（经济学）、教育学等16个学科，其中，“中国社会学”赫然在列。<sup>②</sup>他是中国学者中最早正式使用“中国社会学”此一学科称谓者。刘师培凭借其明确地从学科性上论证中国本有社会学，应该获得群学学科论证者的学术地位。

以上几位均为造诣深厚的大师级人物，他们见到初传入中国的西方社会学，立即能够将其与他们已知的荀子群学相比较，因而异口同声地得出一致的判断。试想，如果对荀子群学一无所知，当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识。可见，绝非如有些论者所言，似乎西方社会学甫一传入，学界就承认“中国本无社会学”，好像这种论调是天然合理、无可置疑的。恰恰相反，至少在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的最初20年间，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这个学科中国古已有之，群学就是中国社会学。这一时期虽有中国学者（如章太炎）以社会学之名译介西方社会学，但并无取代群学之意。

### （二）西方社会学由传教士传入中国，并开始取代群学

#### 1. 教会学校首先用社会学取代群学

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学已经传入中国，并且首先在基督教会兴办的大学占据了讲堂。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创办于1906年，初名为浸会神学院，1909年开设浸会大学堂，1911年两部分合并为上海浸会大学。1914年2月由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sup>③</sup>在北京，由几座基督教新教学院联合而成的燕京大学，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步济时（John Sturt Burgess）先在宗教学院开设

①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94页。

② 李妙根编，朱维铮校：《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89页。

③ 沪江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社会学系，这在学术界看法渐趋一致，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其他大学首先创办的；而对创办时间众说不一，从1911年到1919年说哪一年的都有。其中，阎明在所著《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一书中、王立诚在其编纂的《美国文化渗透与近代中国教育——沪江大学的历史》一书中认为是1914年，前者的观点来源于基督教教会史的英文原始资料，后者依据教会学校档案资料，可信度高。本文采用此说。

社会学课程，1923年在该院创办了社会学系。“为了保持燕京大学的宗教特性，步济时认为，学术研究不应该与学校的实际功能（传播基督教——引者注）和跨文化宗旨（文化殖民——引者注）相分离。”<sup>①</sup>就步济时这位立志为“中西跨文化沟通而不懈努力”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中的模范”来说，之所以积极在宗教学院中建立社会学系，是因为他关注“觉醒的中国青年对基督教的挑战”，<sup>②</sup>为了在渴望求知的青年人中增强基督教的吸引力。为什么选择办社会学系？因为当时社会学在美国还是蒸蒸日上的新兴学科，青年学生感觉新鲜，因而更有吸引力。这就不难理解在步济时治下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早期，只能由外国人讲授外国教材。至于中国传统学术，第一因为不懂，第二因为不需要懂，他们根本不会将其考虑在内。这就造成了“社会学是舶来品”的最初印象或“事实”。<sup>③</sup>而真正的事实却是用西方社会学取代群学肇始于教会大学，始作俑者是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而肩负“文化殖民”使命的传教士。

当然，这种意向仅仅存在于建系初期，即步济时亲任系主任时期，到中国学者许仕廉和吴文藻接任系主任之后，情况就有所扭转了。

## 2. 北京大学别开发展群学之生面

在教会大学取代群学的同一时期，北京大学却是另一种景象。在秉持“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蔡元培校长治下，构建了观点迥异、争论活跃的学术群体，这可视为对其专门论述过的群学的实际运用。蔡元培不仅自己喊出了“劳工神圣”的主张，被他聘为校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也声言“民彝者，可以创造历史”，<sup>④</sup>“二十世纪的群众运动，是合世界人类全体为一大群众”，<sup>⑤</sup>以及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托尔斯泰“无劳动则无人生”命题的阐发，<sup>⑥</sup>从中不难看到群学的实际存在。至于陈独秀、李大钊发动和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更是马克思主义与群学相结合的实践杰作。

① [美] 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程龙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0页。

② [美] 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程龙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9页。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1—5）（最新注释本）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4页。

⑤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1—5卷）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67页。

⑥ 转引自蒋锐、鲁法芹：《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4~175页。

同样，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1923年在概括“北大之精神”时，强调要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sup>①</sup>他主张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蒋梦麟不仅继蔡元培之后明确提出“发展群治”，其对中西会通的学术方针的坚持，也是对群学的继承和发扬。这里需要补充指出的是，1918年蒋梦麟在论述教育学的学科基础时，专门列出了“发展人群”的学科，其中，与人种学、历史地理、伦理学、政治学并列，专门列上了“群学”。<sup>②</sup>这表明他认为群学不仅是思想，而且就是学科。

由上可见，在20世纪20年代，尽管西方社会学挟基督教传教之力强势传入并占据了大学讲堂，但主要还是在有教会背景的学校。而在像北京大学这样的高校以及中国本土的学术团体（包括报刊杂志），群学仍然存在。就名称而言，“群学”与“社会学”依然同时存在、相互混用，或可相互指代。而在“发展群治”的实践方针之下，明显保持了群学的实际影响。由此可见，有的论者所说的到1904年，即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之后的几年之内，“社会”一词就完成了对“群”的替代，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不光是“群”之一词，就是“群学”学科仍然出现在当时教育主管人物的文章里，这种实际影响力不是字词的出现次数之类可以比拟的。

### （三）“社会学中国化”对“西化”潮流的抵制

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的西化潮流占据了巨大优势。对此，部分留学归国学者做出的重要回应就是吴文藻等人发起“社会学中国化”的改革。吴先生“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指燕京大学等校当时的情况——引者注）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他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sup>③</sup>吴文藻先生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提出了尖锐批评，“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用外文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当此期间，社会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sup>④</sup>费孝通认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正反映了当时中国大学里所讲的社会学走上了错误的路子，成了‘半殖民地上的怪胎’。”<sup>⑤</sup>

① 明立志、吴小龙、乾恩等编：《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

② 曲士培主编：《蒋梦麟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1页。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④ 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页。

⑤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吴先生率先在教会大学里用中国语言讲授西方社会学，当时竟被认为是“怪事”。此举“在中国的大学里吹响了学术改革的号角。这个人在当时的心情上必然已经立下了要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使中国的社会和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的决心了”。<sup>①</sup>至于群学，从燕京大学当时的情况来看，按照费孝通的说法，吴先生只能做他“当时能做到的”<sup>②</sup>事情。换言之，在一所教会大学，想要给群学一席之地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如此，当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20世纪30年代在燕京大学讲学时指出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时，这一重大论断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并没有引起什么回响。但这一重大论断却深深铭刻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费孝通的记忆里。

#### （四）“中国本无社会学”成为“定论”，但未“一统天下”

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本无社会学”基本成为“定论”。首先是1943年杨堃提出“中国之有社会学，乃是一舶来品”。<sup>③</sup>继而，1948年孙本文在其所著《当代中国社会学》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并无社会学”这一断言。在杨堃、孙本文（以下简称杨、孙）之前是否已有人提出过此种论点，暂无可稽考。据他们二位文中语气推测，他们的“结论”似乎表达的已是当时相当一致的共识，因而似乎觉得没有必要做出解释和论证。其实，仅据几所高校尤其是像沪江大学、燕京大学这样的教会大学所办的社会学系的课程和杂志刊文，而忽略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著名高校以及更多的报刊，就得出“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的结论，是有失偏颇的。遑论被后人赞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的蔡元培、任职北大校长时间最长的蒋梦麟、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之一的梁启超、尽管英年早逝却也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的刘师培，这些人在杨、孙立论之前都明确肯定、研究或运用过荀子群学，他们的学术影响力不是可以无视的，也不是靠统计当时报刊的文章篇数和词语的使用次数可以掩盖的。不过，被韩明谟称为“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界最有影响、著述最多的社会学者”的孙本文的这一断言，对后世的确产生了极大影响，以至于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中国本无社会学”成为“定论”。

但是，即便在杨、孙之论提出的同时以及其后30多年间，相反的观点仍然可见。这里仅举出如下几位著名学者。

其一，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和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③ 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旦先生对荀子做了独到而精辟的研究。1946年他在《荀子与斯宾塞论解蔽》一文中指出，荀子和斯宾塞关于“解蔽”的论述在对“蔽”的总体理解上、对“蔽”的分类以及“解蔽”的方法上，都存在相似之处。“两人所处的时代，所欲应付的问题，两人在学养上的准备，既都很有几分相像，于是两个人的答案也就不谋而很有几分符合了。”<sup>①</sup> 尽管斯宾塞与荀子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二者“很有几分符合”。这个结论，不仅是在50年后对严复断定荀子群学与作为西方社会学奠基人之一的斯宾塞社会学“暗合”的再次确认，而且从方法论上进一步做了深刻论证。

1947—1948年间，潘先生接连发表三篇“说伦”宏论，对包括荀子在内的儒家关于“伦”的概念做了深入研究。首篇《说“伦”字》开宗明义地表达了对群学即为中国社会学的肯定。他说：“在中国讲社会学，最应该联想到的两个字是‘群’与‘伦’。中国文献里以前没有‘社会’这个名词，但并不是没有社会这一宗事实，也不是没有对于这一宗事实的认识与理解。认识与理解可能不够，但决不是没有。”接着就谈到“荀子对于群的讨论”，指出严复的《群学肄言》的译名“显而易见是得力于荀子的议论”。<sup>②</sup> 如果不是只注意“名称”之类的标签，而是关注实际内容，那么，潘先生显然认为群学就是社会学。至于译名，潘先生认为译为“群学”亦可，译为“伦学或伦理学”“也未尝不可”，因为“社会学所应付的对象，笼统的说是人群，比较更清切的说，更未尝不是‘伦’字所代表的种切”。<sup>③</sup> 显然，“群”的类别和关系就是“伦”。<sup>④</sup> 不论是译为“群学”还是“伦学”，共同的逻辑前提都确认了“中国本有社会学”。

其二，曾担任吉林省社会学会首任会长的丁克全教授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学习社会学时，不仅提出中国自古就有社会学的观点，并且做过论证。从有人对他的介绍中可知，他当时是从中日文的用词含义论证中国古代已有相当于“社会”这样的概念，由此论证中国社会学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早已存在的。<sup>⑤</sup>

其三，国学大家并且学贯中西的钱锺书先生1979年在其名著《管锥编》中坚持使用“群学家”专称。他写道：“群学家考论初民礼俗，谓赠者必望受者答酬，与物乃所以取物，尚往来而较锱铢，且小往而责大来，号曰投

①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1页。

②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③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2页。

④ 潘光旦：《儒家的社会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7页。

⑤ 回清廉：《回族社会学家——丁克全传略》，《回族研究》1992年第1期，第97~101页。

贻，实交易贸迁之一道，事同货殖。”<sup>①</sup>到20世纪70年代末，钱锺书早已知道“社会学”“社会学家”之称谓，为什么仍然使用“群学家”之名称？钱先生与费孝通先生同岁，对20世纪20—40年代学术界使用群学一词称呼“社会学”是认同的。钱先生在被誉为“中国比较文学复兴的标志”的扛鼎之作《管锥编》中，特意使用“群学家”专称，显然认为群学名称比社会学更适合表达中国意涵。

其四，中国台湾的卫惠林教授早年曾任教于复旦大学等高校，在台湾地区有“社会学宗师”之称。1980年在其所著《社会学》一书中也明确指出，“荀子注重社会礼制的研究。荀子可谓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sup>②</sup>

以上四位先生在关乎群学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虽然身处复杂的学术环境，却敢于据实立言、据理力争，坚持了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

#### （五）群学被取代引发费孝通深刻反思

20世纪80—90年代，<sup>③</sup>真正无人再提及群学，这竟是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事。必须指出的是，这个情况仅仅出现在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台湾地区，不仅卫惠林在1980年正式指出荀子是中国第一位社会学者，而且直到2008年台北出版的谢国雄主编的书，名为《群学争鸣：台湾社会学发展史1945—2005》，在这里“群学”与“社会学”是同义的，是可以相互指代的。<sup>④</sup>

在中国大陆，将中国社会学史视为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的论调在这一时期兴起与日本社会学家福武直的影响有关。他在中国社会学刚开始恢复重建的最初几个月就来华讲学，宣扬所谓中国没有社会学的观点。他说：“中国的社会学是从严复把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73）译成《群学肄言》于1903年问世开始的。日本的社会学是1878年由欧内斯特·费诺洛萨在日本讲学的讲稿、特别是1881年由外山正一在东京大学授课的讲义起源的。由此看来，中国比日本晚四分之一世纪才引进社会学。”<sup>⑤</sup>他的意思无非是说，日本有社会学要比中国早很多。其实，中国是

① 笔者从杨善民书稿中获悉，钱锺书正式使用过“群学家”称谓。参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② 卫惠林：《社会学》，台湾正中书局1980年版，第17页。

③ 本文对于群学的命运只讨论到近代，即1949年以前，只是为了说明群学近代命运的后续影响，这里略做延伸介绍，不做专门讨论。关于“群学在现代”的话题容后再议。

④ 谢国雄主编：《群学争鸣：台湾社会学发展史1945—2005》，台湾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版。

⑤ [日]福武直：《中国社会学及其复活》，张建群摘译，《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6期，第73页。

什么时候“引入”西方社会学的，与中国古代是否“本有”社会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不能偷换概念。福武直却用“引进社会学”之一事完全抹掉了中国古代“本有社会学”之史实，其逻辑是错误的。当时的中国学者对中国社会学的起源问题还来不及思考，未可鉴别，此种先入之见不胫而走，看来是影响了当时中国社会学的某些重要人物的。于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正式将严复译著《群学肄言》（1903年正式出版）确定为中国社会学的开端。<sup>①</sup>大百科全书一般被认为是持普遍认可的成熟观点的，不是发表个人探讨性意见的。这反映了此种观点已经非常流行了。

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急于照搬西方社会学，群学的命运跌入了更深的低谷。就消失于讲堂和学术论著的程度而言，甚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个教训引起了费孝通先生的警觉和深刻反思。

社会学恢复重建14年后的1993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座谈会上做了以“略谈中国社会学”为题的主旨演讲。作为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领导者，他一直在思考建设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的问题。正是从这个高度，他多次提到拉德克利夫·布朗教授的前述重要论断：中国在战国时代已由荀子开创了这门学科。<sup>②</sup>费先生指出，搞清楚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前途。他语重心长地说：“找到这问题的答案也许正是我们中国社会学者值得认真思考并去追求的目标。我已年老，这只能作为我的希望留给新的一代了。”<sup>③</sup>此后不久，费先生提出了洪钟大吕般的“文化自觉”概念，显然，费先生认为是否承认“中国本有社会学”是一个文化自信、文化自觉问题。

从以上对群学被西方社会学取代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所谓“中国本无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并不是经过认真的、正式的学术讨论所得出的结论，说这些话的人没有对此做过论证，没有摆出论据，没有对学术界早已存在的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蒋梦麟等人的论点予以回应、加以反驳，也没有对荀子群学做过专门研究。那种话充其量不过是对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高校（尤其是教会学校）、社会学界存在过的一种认知的默认，是一种心态的反映。因此，连“结论”都称不上，遑论“定论”。学术研究应该秉持严谨、严肃的态度，从实求知，避免陷入盲从。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编委会：《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44页。

③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44页。

## 二、群学被取代的原因探析

探讨群学被取代的原因，首先怀疑的是群学本身。群学诞生于战国时期，是否难以适应向现代的转型？如果从“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出发，很容易提出这个质疑。然而，前述的清末民初思想先驱们并不这样认为。恰恰相反，他们以对群学内涵的深刻理解，认定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是“正同”的。

首先，从问题意识来看，中国春秋战国的550年间，诸侯混战，兴亡更替，从几百个诸侯国到最后由秦统一天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千年大变局”。到战国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和基本制度的艰难抉择，如何重建秩序成为时代的呼唤、学术的主题。此时群学应运而生，其问题意识就是重建秩序。在欧洲，经过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继而发生的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的工业革命和政治大革命，到19世纪也是五百年的社会剧变、思想交锋，同样是西方历史上的“千年大变局”。这就决定了19世纪中后期诞生的西方社会学的问题意识也聚焦于重建秩序。至于中西“重建秩序”的时代之间不是发生在同一年代而是相距了两千年，那是由中西历史经纬和不同学术脉络决定的。历史不是按照进化主义逻辑演进的，但在中西历史的不同时代，却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时代之问”需要有答题之人。在战国时期，答题之人来自涌现出“诸子百家”的“士阶层”。荀子作为战国末期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在“最高学府”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最为老师”，<sup>①</sup>博采“百家”之长，他之创立群学绝非偶然。而在欧洲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阶层的出现，“西方学人几乎一致认定……大概不能早于18世纪”。<sup>②</sup>答题之人的出现相差两千多年，这也是群学与西方社会学虽然内涵“正同”却诞生于不同时代的重要原因。

其次，从学科基本概念来看，确实可以明显发现不同时代的烙印。不过这主要是在用词习惯和呈现形式方面，所表达的内容则是“暗合”的。笔者等人的《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一书，从浩瀚史海中精选了4个基础性概念和30个基本概念，构成了群学概念体系。以此作为证明群学存在性的根据，也是其历史绵延性的载体。群学概念体系以群、伦、仁、中庸为基础性概念。在四个基础性概念之上，以合群、能群、善群、乐群为主线，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层面，逐次展开基本概念之间的关系。在合

<sup>①</sup> 《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48页。

<sup>②</sup>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第3页。

群/修身层面的基本概念是身、己、性、气、心态、社与会、天、自然；在能群/齐家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家、宗族、孝、礼、义、信、利；在善群/治国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国与民、国土、士、王道与霸道、贤与能、科举、公与私、秩序、位育；在乐群/平天下层面的基本概念是天下、势、变、和合、多元一体、大同。在群学概念体系中，合群、能群、善群、乐群既是社会关系和状态，回答社会是什么的问题；也是行动和实践，回答怎么办的的问题；更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的统一，这是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特质和传统。群学概念体系体现了中国社会学的基因和特色，彰显了中国社会学的独特优势。<sup>①</sup>

乍看起来，这些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明显不同，有的甚至不易对译，但究其内涵，却是相当一致、可以沟通的。其中，合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个人社会化的相关概念、能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的相关概念、善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制度以及社会治理的相关概念、乐群层次的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关于社会秩序和社会理想的相关概念，不仅含义相同或相近可以沟通，还可以互补。<sup>②</sup>

最后，从方法论来看，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基本方法和论证方式上也是大同小异的。在学术史上，实证主义出现得并不算早，但实证方法早就有了。特别是荀子，被中外学者认为是擅长实证研究的大师。哈佛大学本杰明·史华兹教授认为荀子在儒家学派中是“最富于‘社会学色彩的’”。<sup>③</sup>他指出荀子主张“以自然的实证化技术为导向的思想范式”，并认为“假如诸如此类的观点在科学事业中多少也占有主导地位，那么，荀子可以勉强被说成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倾向的先驱”。他还说：“荀子的科学是完全以对于自然所作的具体观察为基础的，不过是依照自然自发呈现在日常经验中的样子进行观察而已。”<sup>④</sup>著名科学技术史大家、剑桥大学李约瑟教授甚至认为“荀子的观点也许是过于实证化和技术化了”。<sup>⑤</sup>我们看到荀子称自己的研究方法，用的词就是“参验”“可稽”“解蔽”，与“实证”含义相同或相近。

① 景天魁等：《中国社会学：起源与绵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2~111页。

② 对此的具体论证相当费笔墨，这里不宜展开。如有兴趣，请参见笔者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史》第1卷（2019年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第6卷。

③ [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05页。

④ [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

⑤ 转引自[美]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21页。

至于2200多年前的荀子没有运用我们今天使用的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那自然是不能苛求古人的。

由以上辨析可知，群学与西方社会学既然问题意识“正同”、基本概念“暗合”、研究方法和论证方式相似，那它们就是可以兼容的、能够会通的，二者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按理说，西方社会学即使再强势，传入中国以后也应该与本土学科资源相结合，这也有利于它的传播和应用。可见，群学遭到被取代的命运，根本原因不在其本身。如果纠结于群学与西方社会学在形式上的区别，所能看到的也只是表象，不是实质。那样就找不到从“中国本有社会学”反转到“中国本无社会学”的根本原因。看来，必须回到前述对群学被取代的历史过程的考察中，根本原因要到当时的社会情势中去寻找。

从社会情势来看，群学在高校和学术界被西方社会学取代的原因有间接与直接之分。间接原因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只将其作为背景不展开讨论，这里只提出几点直接原因。群学之名被社会学取代，不是一个名称选择问题，更不是一个翻译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文化大势、学术背景、社会心态问题，也是一个教育失误问题。

### （一）文化大势

对比一下基督教在明代的传播，当时国运未衰，虽然中西文化有冲突，但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了在中国站住脚跟，只好极力放低身段，穿上儒衫，学习中国礼节。可是到了清末，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美国传教士的姿态就不同了，他们目空一切，摆出了基督教那种有你无我、排斥异己的独占式传播架势，与中国本土的儒释道三教融合风气截然相反。明代传教士与清末传教士基本姿态的不同，是文化大势逆转的表征——传播者的姿态由适应转为替代，传教活动的性质由宗教转为政治控制和文化侵略，接受者的姿态从吸纳转为依从——这具备了美籍华人著名社会学家林南所称的“文化殖民”<sup>①</sup>的基本特征。

尤其是美国看到当时中国的数万学生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对中国的政坛和思想界影响巨大。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Edmund J. James）给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备忘录”中献计称：“中国正临近一次革命……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新一代青年中国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的影响上取回最大的收获。如果美国在30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一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

<sup>①</sup> 林南：《中国研究如何为社会学理论做贡献》，周晓虹主编：《中国社会与中国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sup>①</sup>这段话暴露了当时的美国试图通过培养留美预备生、归国生来影响中国知识人和中国的意识形态的想法。

不管怎么说，从本文关注群学命运的角度看，不难理解美国传教士兴办的社会学系根本不可能理会中国古代是否有社会学的问题。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也根本想都不想。在他们办的社会学系里，一开始教师都是美国传教士，后来中国留学生学成归国了，经过斗争才有了登上讲台的资格，但也必须用英文、讲西方社会学。显然，在此情况之下群学至少在教会学校里被取代是不可避免的。

## （二）学术背景

那么，在美国兴办的教会大学之外，群学为什么也难逃被取代的命运呢？这就要看当时一个重要的学术背景。甲午战争中国惨败，激发了有识之士对日本的重视，为了探寻其在东亚迅速崛起的原因，掀起了从日本转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高潮。我们现在使用的大多数学科名称都是这一时期从日本转译过来的。仅是社会学著作，除前面提到的1902年出版了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译本之外，同年还出版了贺长雄的《族制进化论》译本，1903年出版了从市川源三之日文译本转译为中文的《社会学提纲》，1911年出版了欧阳钧据日本远藤隆吉的《社会学讲义》编译的《社会学》等。我们现在可以用冷静的眼光认为这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可在当时却是一股强劲的“风潮”。它像狂风一样裹挟着，扫荡而过，像基督教传播社会学的取代性方式一样，兴起了来自日本的学术性取代方式。

如果以为用社会学取代群学只是一个译名问题，那就太肤浅了。背后牵涉的是中西两大学科体系问题、话语权问题。我们今天之所以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绝不是纠缠译名问题，那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问题在于，不能因为将“sociology”改译为“社会学”，“群学”原本的内容就不存在了，中国就本无社会学了。如果说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或者出于自愿自觉，或者随波逐流地把这个问题只当作“译名”问题，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研究群学被取代的原因来说，这可是一个不容淡化的学科命运问题。

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名称，中国古代都没有。没有这些学科之名，不见得就没有这些学科之实，不过是叫法不同、形式不同而已。如经济学我们古代叫计学或货殖之学，逻辑学我们古代叫名学，语言学我们古代叫词章学，如此等等。这本来是不同学术体系学科分法的不同，不是学

<sup>①</sup> 转引自韩明谟：《20世纪百年学案：社会学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2页。

科有无的问题。但是，很多中国人自己却把它误认为是学科有无问题。导致这种混淆的原因，在于承认欧洲19世纪的学科标准的唯一性。如果只承认西方学科标准，中国古代相应的就只能是一片空白。这个问题里面的一个重要症结就是中西两大学术体系各有自己划分学科的标准和方法。社会学这个学科是否只在西方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是否只能以西方划分学科的标准为圭臬（且不说其实西方未必有统一明确的学科标准）。只要在心目中相信唯有欧美社会学才是正宗、先进的，就会只接受社会学是1838年由孔德创立的这一个事实。只要有了这个先入之见，就会自然地接受西方19世纪划分学科的标准，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个所谓“标准”是什么，也根本不会去想是否还会有别的什么标准，而只要心底承认中国学术是落后的，那就不会对“学科标准”做理性思考。在这里，正如并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就用“中国本无社会学”取代了“中国本有社会学”、就以群学与社会学的译名问题掩盖了中国社会学的有无问题一样，同样没有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就以学科划分方法问题混淆了学科有无问题。可见，这里不单有学术问题，社会心态也是起到重要作用的。

### （三）社会心态

可惜的是，清末民初西学大举进军中国，在中国军事上接连溃败、大清帝国不堪一击、军阀混战、国势衰颓的同时，中国学术包括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更是丢盔弃甲，溃败得比军事上更为不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迅速丧失了。对此，林耀华先生1932年在《严复研究》中感叹说：“国人愤于中日战争之败而欲自强之道。故此种学术之来，趋者若鹜焉。于是西学广布，深激人心。转至清末民初，国人崇尚西学，而轻汉学，至是能不为叹乎？”<sup>①</sup> 当此情景，还有数人能够理性思考斯宾塞社会学与荀子群学的内在关联已经难能可贵了，哪里还能奢望群学不遭厄运呢？

不光是群学，整个儒学乃至中国全部学术传统，都被当作批判对象，必欲连根铲除而后快，“孔家店”被打翻在地，还要再踏上无数只脚。

不光是学术，全部中华文化都被看作中国之所以落后挨打的总根源。心平气和一点的人们提议将中华传统文化送进“古董博物馆”，其若仍在现代社会流行，便应当被投入垃圾桶。激情多一点的人们甚至断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或主张“弃吾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尤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将中文比作“顽固人所嗜之弃痂”。<sup>②</sup>

不光是文字，整个中华文明的起源、人文始祖的认定乃至中国人种的来

<sup>①</sup> 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转引自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98页。

历，都被“西来说”笼罩。当然，这些问题最终要靠考古证据说话，远非本文讨论的范围。与本文有关的是清末民初“中华文明西来说”得以风行的社会心态原因。就连章太炎、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都在明知西方学者宣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乐于接受之，原因竟然是为了显得我们的祖宗原本不是弱者，我们也是有“胜利者”“征服者”血统的。当时著有《中国人种考》的蒋智由声称“讲明吾种之渊源，以团结吾同胞之气谊，使不敢自惭其祖宗，而陷其种族于劣败之列焉”。<sup>①</sup>靠声明自己的祖宗是“西来”的，给自己壮胆，提振人们之“气”，忘却“自惭”“劣败”之痛，实在是可怜可叹之至。

今天已经挺起腰杆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社会心态的具体情形，但不难理解像群学这样的传统学术会无人问津。甚至也可以推知在此种社会心态下，“西化”浪潮自然会如入无人之境，可以目空一切。即便如此，却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严肃的学者会对前辈学者相当肯定的群学采取完全无视的态度。这种“无视”在学术上并非严肃的态度。如果自己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可以说“不知道中国古代是否有社会学”，也可以什么都不说，但不可以没有论据就声称“中国本无社会学”。“无视”也是需要理由的，不能因为无视你存在，所以你不存在。这是一种极端蔑视的态度。可是换一个角度看，“无有”是因为“无视”，因无视而蔑视。由此得到的“中国本无社会学”的结论，岂不就只能是无视和蔑视的产物了。于是，对于“中国本无社会学”之立论既不需要论据甚至也不需要论证的想法，也就可以找到可能的解释了。

在这种社会心态背景下，回眸晚清以降的学术时空，仅就群学而言就越发反衬出——首先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蒋梦麟，继而是潘光旦、丁克全、卫惠林、钱锺书、费孝通——这些学者眼光卓绝、灿若星辰！

#### （四）“忘本的教育”

为什么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群学，到了民国时期却承认者寥寥呢？潘光旦先生在1933年写有《忘本的教育》一文，可能不是专指群学之一事，但这里可就此文的角度做一分析。他说：“三十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点上。新式的学校教育……所见的环境，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而是二十世纪西洋的环境。……因为忘却了固有的环境，忘却了民族和固有的环境的绵续性和拖联性，以为对于旧的如可一脚踢开，对于新的，便可一蹴骤几，他们并不采用逐步修正固有的环境的方法，

<sup>①</sup> 转引自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

而采用以新环境整个的替代旧环境的方法——结果，就闹出近来的焦头烂额的一副局面。”<sup>①</sup> 潘先生所说的“本”，是指民族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他称之为“历史的绵续性”。“忘却了固有的环境”，用“西洋的环境”即西方文化和学术“替代”中国“固有的环境（文化和学术）”就是“忘本”。“新式教育”“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对于以往的文物，宣告脱离关系，并且脱离得越决绝越好似的”。这种“新式教育”实际的坏处“就是在教育上养成了‘古旧’与‘恶劣’变做通用名词的一种风气。凡是古旧的一定是陈旧的、一定是恶劣的”。<sup>②</sup> 在这篇《忘本的教育》之后，潘先生又陆续写了《教育制度的修正》（1934年）、《国难与教育制度的忏悔》（1936年）、《说本》（1939年）、《说乡土教育》（1946年）等，“所跨的时限虽有十二三年，立场只是一个，就是‘务本之义’”。<sup>③</sup> 这些雄文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界和高校的思想倾向。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潘先生虽然也是留美归国的著名学者，却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深厚的学养和情感，对当时身处的西化潮流能够保持独立而清醒的认识，对“忘本的教育”能够给予尖锐而深刻的批判，由此不难理解费孝通先生为什么在潘先生百年之后仍一再地表达对他的由衷尊敬。这里还要指出，考察20世纪30—40年代的社会学思潮，不能只看少数几所大学特别是教会大学，潘先生的卓见实为与“忘本”相反的“务本”思潮的代表。

对中国社会学来说，“本”就是群学及其两千多年来的学科传统。如果说在古代由于中国学术体系与西方不同，那时的学者未使用“群学”之名并不妨碍他们默认群学之实，因而不存在对待学科传统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首先在中国教会大学创办社会学系的美国传教士们根本不理会中国古代是否有社会学的问题，那也与学科传统了无关系；那么到了20世纪40年代，前述社会学界头面人物居然对前辈和同辈若干著名学者的“中国本有社会学”之论不做任何回应，反而在没有对中国悠久的学术史做过专门研究的情况下竟然断言“中国本无社会学”，说明他们认为对于包括群学在内的中国传统学术，就连回应的必要也没有了。而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不回应是非常不应该的。至于“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论调是否“忘本的教育”造成的结果，潘光旦先生没有直说。我们看到潘先生批判“忘本的教育”的几篇文章正是发表于“中国本无社会学”之论调渐居主导地位之时，而且这期间潘先生还专门谈到了“中国的

①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5~556页。

②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7页。

③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8页。

社会学”，指出“研究社会的人不通晓历史，却有很大的危险”，<sup>①</sup>那么潘先生是何所指呢？

总而言之，（西方）强权、（对中国学术史的）无知、（中国人的）自卑、“忘本（教育）”四个因素是导致群学陷入被取代厄运的直接原因。由此我们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就非常清楚了。

### 三、群学转型的教训

群学转型付出了几乎被取消这样沉痛的教训，要总结和吸取教训却很难，因为这是需要前提的。如果不了解群学、不重新认识中国社会学悠久的历史，那就不可能正确地看待群学转型；如果不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羁绊、不正确认识中西社会学之间的关系，也就不能正确看待群学转型。在这里，“前提”和“结果”是相互纠缠、相互转化的。因此，我们不但要总结出教训，还必须对教训做出解释和论证。

#### （一）群学转型必须护“根”固“本”

群学在近代的命运告诉我们，群学转型本来有主动转型，也有被动转型，但被动转型却转成了取消群学。而主动转型其实早就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迟自明代中期以来群学心性化就是一种转型的努力，与荀子群学和秦汉制度化时期相比，唐宋时期群学发生民间化，已经开始回应社会结构、群己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如果说群学民间化还不能算作向近现代的转型，<sup>②</sup>那也至少可以说是为此奠定了历史基础。到了明清时期，阳明心学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人的主体意识、个人自由和平等观念的萌动，崭露出别开生面的新局面。当然，群学转型不像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那么激烈，变化幅度不很大、社会震动力不够强，效果不彰。但是总体上在变，并不是停滞不变的。所以，把群学被取代的原因归结为群学本身落后、跟不上近代的步伐，至少是根据不足的。

群学转型，初衷是为了解决其本身的现代化问题，或者说是为了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然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指出的，自清末民初西方社会学强势传入以来，受“传统—现代”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无论是

<sup>①</sup>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9~430页。

<sup>②</sup>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曙光到底出现在宋代还是明代或更晚，史学界众说纷纭。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迈向大众社会学——追寻中国社会学的品格塑造》一文中，从群学演进史研究的角度谈到了基本态度，即不论在历史学的意义上是不是“近代化”之“新”，讲“近代性”总是可以的，因为近代性因素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不论“化”到什么程度，在群学的演进史上，确实开辟了大众化的新阶段，开创了群学民间化的新形态。

‘戊戌’的维新变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和‘现代化’对立了起来，把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作了‘现代化’的敌人。‘文化大革命’达到了顶点，要把传统的东西统统扫清，使人们认为中国文化这套旧东西都没有用了”。<sup>①</sup>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连根拔了”<sup>②</sup>的极端化的偏执，将群学转型引入了取消群学的陷阱。

积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已经逐步摆脱了“幼稚病”“偏执狂”，能够用冷静的、平和的心态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了。中国实现现代化并非简单地对传统的否定，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必须对之进行批判和否定，但也有些优秀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明是绵延不断的，中国社会也是连续演进的。这种连续性决定了中国实现现代化不是断裂式的跃升，而是革新与继承的统一。群学转型是一个深刻的文化转型、学术转型，是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的反映，不是简单地取代、弃置、忘掉。那样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只能陷入歧途。

研究中国社会，必须有历史眼光、历史逻辑、历史方法、历史精神。像美国那样只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其学术不可能有厚重的历史感；那些文明中绝过的国家，也不可能真正深刻地体会文化连续性的意义和价值。像中国这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而且保持历史连续性的国家，再如何现代化也不可能脱离历史根基，再激进也不可能割断历史联系。恰恰相反，只有自觉地树立历史意识，将现代科学方法与历史、与人文、与国情结合起来，才可能对中国社会做出贴切的、深刻的解释。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迄今130来年的历史表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并不能取代群学基本概念，并不会因为要搞现代化，群学概念就必须被抛弃。而这个问题并非只是学术概念问题，也是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问题。“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不能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转向西方文化认同？”<sup>③</sup>费孝通先生这里讲的文化认同，对群学或者中国社会学来说，就是学科的“根本”问题。那种认为“中国本无社会学”“中国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社会学史是西方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史”的观点，在文化认同即寻根的意义，上，岂不是硬要这个学科丢弃自己的老祖荀子，而到孔德那里去寻根？诚然，学术研究各有所宗，人各有志，不可强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② 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56页。

③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求，应该尊重异己之见。我们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那种在中国流行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且被奉为“定论”的东西，不可能轻易颠覆。但是，历史已经证明，将西方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套用到中国经验事实的做法，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学。如若不信，我们还可以耐心地等待未来实践的检验。

有必要辨析的是，笔者所说的“根”“本”问题，指的是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本义，与20世纪30年代的“体用问题”有区别。笔者不认为西方社会学对我们来说只是“用”，如果其精华部分有助于中国社会学强身健“体”，也不应排斥。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固守中国学术的“体”，而是群学应不应该被承认、被尊重。我们主张“中西会通”，至于如何会通，如何取长补短，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学，那要靠今后一代一代年轻学者的努力。中国学术的优秀传统是兼容并包、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这样做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学必须确认自己的“根”和“本”，然后再广泛汲取营养，才可能根深叶茂。没有自己的“根”，攀附在别的树干（“本”）上，充其量只能长成“藤”，自己永远挺立不起来，不可能长成参天大树。

## （二）“社会学中国化”要与时俱进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表明：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等人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化”什么、怎么“化”，却要随着社会和学术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参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分为四步。

第一步费先生称之为“初步工作”，就是“把中国社会的事实充实到社会学的内容里去”。这在20世纪30年代的初期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用中国已有书本资料，特别是历史资料填入西方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理论；另一种是用当时通行于英美社会学的所谓‘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描述中国社会的论著。在当时的教会大学里偏重的是第二种倾向”。<sup>①</sup>这方面贡献较大者可以李景汉的定县和北京农村调查、杨开道等人的清河调查为代表。

第二步费先生称之为“进一步发展”。吴文藻对上述两种研究方法都表示怀疑，认为都不能充分反映中国社会的实际。于是他从1933年开始引进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人类学方法，开展深入到群众生活中去观察和体验的田野调查。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中国人研究中国（本社会、本文化）必须注意中国特色，即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个性”。<sup>②</sup>这“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优异的成果，就是诞生了“社会学的中国学

<sup>①</sup>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sup>②</sup>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派”——社区学派，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和林耀华的《金翼》是杰出代表。

第三步费先生称之为“改造和创新”。“改造”什么，“创新”什么？对于“改造”什么的问题，费先生认为：“社会学在中国，在我看来在解放前并没有打下坚实的基础。……它是正处于有人想改造的时候中断的，所以提到恢复这个学科，我曾经认为它是先天不足。”所以，社会学恢复重建“不只是在大学里恢复一门学科，在大学里成立社会学系，而是要社会学本身进行改造和创新”。<sup>①</sup>“改造和创新”首先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和从具体现实的人们生活中去认识和表达社会事实。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在这个方向上是取得了很大成绩的。对此大家都很熟知，这里不必详述。

但对于“创新”什么的问题，费先生一直在持续地探问和思考。原来理解的“社会学中国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意思就是主张中国的社会学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sup>②</sup>而以往几十年的“社会学中国化”历程却表明，如果只是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再怎么联系，也难以实现“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初衷，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是没有建立起来。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从历史经验看，必须冲破“拿西方社会学理论联系中国社会实际”的“化”法，而是既要“化”实际，也要“化”理论。到“中国化”的更高阶段，则要先“化”理论，才能“化”实际。

费先生晚年的“补课”和“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正是意味着对社会学中国化含义的扩展。在1993年的《略谈中国社会学》中，费先生提出中国社会学的历史起源问题，一再提到拉德克里夫·布朗教授关于“社会学的老祖是中国的荀子”这一重大论断；1997年他首提“文化自觉”概念，此后多次对此做出深入阐发；2003年他发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提出达不到人文的层次，社会学就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的论断。这些思考意味着费先生对于“社会学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即不仅“应当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还要联系中国的思想实际、学术资源和传统。

这样看来，在“改造和创新”的基础上，“创新”什么问题就可以有个结论了，那就是创造新的辉煌——作为第四步的“社会学中国化”就是要创新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实现中国社会学的崛起。要实现这个“创新”，“社会学中国化”就要解决用什么“化”实际的问题——要用理论“化”实际。所以，先要“化”理论。理论怎么

①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②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化”？费先生晚年的伟大探索告诉我们，就是要解决中国社会学的起源问题、扩展学科界限问题、增强学科自信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古今贯通”和“中西会通”。

### （三）中西会通必须以古今贯通为基础和前提

西方社会学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启发我们追问：应该用什么“化”（西方）社会学理论？说“中西会通”，前提是自己要有一个东西才能去“会”（西方）社会学理论；说是要“接轨”，自己手里要有一个“轨”才谈得到去与人家的“轨”对接。然后才谈得到“交流”“对话”的可能，有了“交流”“对话”的可能才谈得到平等对话、相互交流。现在，我们证明了群学就是中国本有之社会学，就说她是“古旧的”，她也总算是我们手里可以持有的“轨”，总是可以与人家“会”一“会”的东西。更何况其内涵是何等的丰富、历史是何等的绵长、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巨大，完全有资格、有本钱与西方社会学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

而且，历史事实证明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不仅可以会通，而且只有会通，才能接地气、更有解释力。只有实现群学基本概念与西方社会学基本概念的会通，才可能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所以，在古今贯通与中西会通的关系上，我们坚持认为群学的古今贯通是中西社会学实现会通的前提。因而，群学是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必要基础。

### （四）搞好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建设

那么，怎样实现群学的古今贯通和中西社会学的会通呢？前提条件是搞好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建设。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建设在事务上是建立机构、扩大队伍等，在学术上的基础就是中西兼备。只有兼备才能会通，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学中国化”。

怎样找到古今、中西之间达致良性关系的关键点？费孝通指出：“我反对唯书、唯上、脱离实际、贩运洋货的风气。我也认为学术领域里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但必须有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的精神，这样才能通过百家争鸣，繁荣学术。”<sup>①</sup>这实际上是中国自先秦百家争鸣以来发展学术的基本经验。20世纪30—40年代，一些人标榜自己学来的社会学是“纯正的”，指责别人是“混作的”；把社会学划分为“正宗的”与“旁出的”、“正式的”与“不正式的”。你不承认人家，人家也可以不承认你。20世纪30—40年代的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与50—60年代的“取消（资产阶级）社会学”看似正相反，背后的逻辑却都是不符合学术发展规律的。中国第一

<sup>①</sup> 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个学术高峰（梁启超赞为“全盛中的全盛”）是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群学是其中的硕果之一。21世纪又来到费先生所说的“新的战国时代”，也要在学术争鸣中相互借鉴、相互启发、相互补充，才能迎来社会学新的崛起。

潘光旦提倡“务本的教育”，“本”虽然是指中国传统学术资源，但绝不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中西兼备，融会贯通。费孝通晚年明确表示，对他在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主持编写的《社会学概论》是不满意的，他在晚年写的一系列反思性文章包含着关于中国社会学基础建设的深刻思考。他提出“文化自觉”，就源自对社会学基础教育的自我反省：“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响下的‘新学’教育。”幼时“连《三字经》、《百家姓》也没有念过”，长大读的是教会大学，所以对于中西文化的矛盾没有什么感觉，不像上一代学者那样“对中国文化的长处有亲切的体验，甚至有归属感”。<sup>①</sup>老先生这些披心相付的“自白”警示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必须重视知识基础的基本建设问题。这与潘先生提倡的“务本的教育”是完全一致的。

在潘先生发表《忘本的教育》89年之后、费先生发表《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20年之后，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学如何走向崛起的大问题时，深感搞好中国社会学基础建设、明确“务本”“兼容（中西）”方针的重要性。笔者不揣庸陋，2014年连续三次在社会学讨论会上呼吁改革社会学基础教育，提出了“先中学后西学，然后兼通中西”，即“先讲中国的，再讲西方的，脚下先有个根，然后再往上长”的建议。<sup>②</sup>否则，学生刚接触社会学，就植入了“社会学是舶来品”“中国本无社会学”的先入之见，我们却还想建设什么“中国特色社会学”，岂不是南辕北辙？

### （五）增强学科自信

从“文化自觉”到“学科自信”，前提都是要有中西兼备的知识基础，否则“自信”也是空虚的。前面提到的清末诸子如果没有深厚的中国学术修养，如何能够在西方社会学刚刚传入之时就能断定“中国本有社会学”？如果没有浓重的中国情结，吴文藻等从西方留学归国的前辈如何能在教会大学竖起“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旗？如果没有坚定的文化自信，潘光旦、丁克全、卫惠林、钱锺书等前辈如何能够在群学几被取代的情况下，仍坚信群学就是社会学？如果没有高度的文化自觉，费孝通如何能够深刻反思社会学恢复重建过程，并发出研究荀子群学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未来”这样的

<sup>①</sup>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16卷，群言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

<sup>②</sup> 景天魁：《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根本问题——从“社会学的春天”谈起》，《学术界》2014年第9期，第20~33页。

振聋发聩之论？可见，中西兼备的知识基础、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信是实现中国社会学崛起的必备要素。

文化自信对社会学来说主要就是学科自信。群学的近代厄运在很大程度上是外部因素强加的结果，现在那种外部因素消除了，我们何苦还要自我禁锢、继续固守那些在外部因素强力作用下所形成的偏见呢？其实，只要放弃“社会科学源于欧美”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抱持应有的文化自信的心态，顺着中国传统的知识分类，而不偏执于欧洲 19 世纪的学科分类，确认群学就是中国古典社会学本来是顺理成章的。

学科自信也是一种学术主体性。既然“中国本无社会学”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就应该立足“中国本有社会学”，接续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所谓“主体性”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担责。我们一代一代的先人，学问搞得不好，就归功于圣贤，归功于经典；搞不好，不能怨古人，不能怨“传统”，只能怨自己。这也是所谓“主体性”的含义，也应该是费孝通提倡“文化自觉”的应有之义。

学科自信还是对学科使命的自觉意识。只要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伟大复兴，那么，不论中外势必要求对复兴的原因做出深刻的解释。是拿中国自己的学术、自己本土的语言来解释更接地气、更有说服力，还是要一味地、片面地依赖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呢？中国问题要我们自己回答，中国经验要我们自己总结。中国的复兴必定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中国学术的复兴。我们有博大精深的学术传统，且不说传承中华文化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责任，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说，我们有如此宝贵的学术资源，为什么弃而不用呢？

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文化的本质“确实是从中国人历来讲究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发展出来的。这里边一层一层都是几千年积聚下来的经验性的东西，如果能用到现实的事情当中去，看来还是会发生积极作用的。我们中国文化里边有许多我们特有的东西，可以解决很多现实问题、疑难问题。现在是我们怎样把这些特点用现代语言更明确地表达出来，让大家懂得，变成一个普遍的信息和共识”。<sup>①</sup>费先生这里指出的就是先要实现“中国化”，然后走向“普遍化”“世界化”的道路。笔者认为，明确“务本”“兼容（中西）”方针、坚持先“中国化”后“普遍化”，<sup>②</sup>可视为中国社会学实现崛起的道路。

（责任编辑：温莹莹）

① 费孝通：《费孝通文集》第 16 卷，群言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1 页。

② 景天魁：《从社会学中国化到中国社会学普遍化》，《人民日报》2015 年 11 月 23 日。